

女性天才與西方基督教歷史^①

Female Genius and Western Christian History

[英] 愛麗森·賈思柏 撰 張靖 譯

Alison JASPER

Abstract: Though women's lives have been fragmented in ways analysed very acutely by Simone de Beauvoir in 1949, I argue they have not merely suffered but sometimes have dealt creatively with this fragmentation; sustaining forms of resistance, tradition and connection in limiting circumstances. I argue tha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gloss over these instances of women's creative management in limiting circumstances but to try to do full justice to women who have struggled to become human subjects at some cost. Not to do so, is to exclude and belittle women all over again. Using philosopher Julia Kristeva's idea of female genius, I try to find a way of acknowledging this achievement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the obstacles women have undoubtedly faced. In this lecture, I illustrate my point in reference to a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ristian mystic, Jane

145

^① 本文是在另外一篇文章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參 Alison Jasper, "Female Genius: Jane Leade (1624-1704),"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New Interdisciplinary Spaces*, ed., Heather Walton (Farnham, Surrey, 2010).

Leade. In the larger project I have looked in detail at further examples.

Keywords: Simone de Beauvoir, Julia Kristeva, Jane Leade, female genius, history of English women.

“她們沒有過去，沒有歷史，沒有屬於她們自己的宗教”^①

一、《女性天才》課題簡述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也許會將基督教當作可“輕易拋棄的歷史垃圾”^②。筆者卻無法走到這種極端並拋棄整個傳統，儘管這不是因為筆者認為純粹的人類學或人文學角度無效。筆者同意這樣的觀點：在工業和後工業社會剝削女性及其他人群有著結構性原因（如階級和經濟原因）^③。筆者還接受這樣的觀點：這些剝削性的結構經常以基督教的名義保存下來了。與此同時，筆者感覺我們依然有必要說明某些女性個體之思想與行為。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宣稱，正是基督教激勵了她們，讓她們打破性別傳統習俗的障礙並反抗各種明顯的男權壓迫形式。因為這個原因，筆者無法完全贊同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說法：西方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19.

^② Boer & Øklund, *Marxist Feminist Criticism*, 22.

^③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術成果總結參見，Roland Boer and Jorunn Øklund, eds., *Marxist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8), 1-25.

女性沒有過去、沒有歷史、也沒有宗教^①。確實，女性的生活已經裂成了碎片，“散落於男性生命之中，通過住房、家務、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與某些男人（比如父親或者丈夫）捆綁在一起，她們與男性的這種聯繫比她們與其他女性的關係更為牢固”^②。但與此同時，女性並不僅僅只在承受苦難，她們有時在受限制的環境中很有創意地應對這種碎片化的生活，並保存了反抗、傳承及聯繫的各種方式。筆者認為，為了有效地質疑男權統治，我們很有必要不去掩蓋女性生命的燦爛，不能以為她們在這些限制性的環境中註定最終會失敗。在筆者看來，輕描淡寫地說一句“這不是她們的錯”對女性來說是一種冰冷的安慰，而這些女性一直在努力思考、寫作或講述她們的故事，並在付出一些代價後獲得她們的主體性。筆者希望能在無需忽視她們毫無疑問面臨的困難的前提下找到一種方式認識並承認這些女性的貢獻。筆者在本文中將試圖以簡·利德（Jane Leade）為例說明這一觀點。在筆者從事的更大的課題研究中有更多的例證並且論述更深入^③。

波伏娃的分析認為，男性已經成為一種標準。這個分析本身表明，女性的渴望（female desire）被邊緣化了，而這就造成了女性碎片化的生活感受。女性的渴望是能更好地生活、更快樂並能更自主地決定她們是誰以及她們要做甚麼。但是筆者認為，這些渴望即便被邊緣化了依然能找到表述的方式，而且如果我們睜大

^①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19.

^② Ibid.

^③ 參見 Alison Jasper, *Female Genius And Feminist Theology: Four Historical Cas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Waco, TX, 2011). 本書即將出版。筆者還考察了其他三位女性的生命與工作，她們是：漢娜·莫爾（Hannah More, 1745-1833），茉德·羅伊登（Maude Royden, 1876-1956）和米謝勒·羅伯茨（Michèle Roberts, 1949-）。

眼睛就可以看到女性所表達的這些願望。如果我們以為，在波伏娃選擇了以哲學家的身份來寫作《第二性》時，她是第一位大聲表述了女性願望的女性，那麼我們的想法就愚不可及。波伏娃並不是憑空（*ex nihilo*）創造了一個女性的角度。她的作品對女性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她為女性渴望提供了新的定義，讓女性可以在面對不可否認的困難時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承認，但是她所說的肯定是在她之前的女性所理解和認同的觀點。即便以前沒有女性主義理論知識，也肯定不能阻止女性意識到她們僅僅因為性別而被禁聲、忽略和蔑視。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歐洲以及整個英語國家的政治運動以及喧囂和有時暴力的抗議活動中^①，這一點很容易闡明。雖然波伏娃觀點的狹窄邏輯停留在女性被禁聲的狀態，她的作品是另外一個故事的明證。她沒有被她自己的狹窄邏輯限制住，或者說她不是總被其限制的^②。她分析並且幫助解釋了女性在男權制中被制約的狀況，而且她將女性環境或狀態當作一個嚴肅的哲學主題來對待。正是在這樣的寫作活動中，她努力給女性一個更強大的聲音，並因此增加了影響社會和改革文化的機會。

但是，波伏娃思想的光芒有時會讓我們看不到一個更為複雜卻可能較少負面影響的圖景。儘管波伏娃表達了改變的願望，我相信這與在她之前的女性們一致。但她們中不是所有人都在以波

^① 參見 S. J. Kleinber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45 (American History in Depth)* (New York, 1999) or Jane Purvis, *Women's History: Britain 185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1997).

^② 比如潘蜜拉·安德森（Pamela Sue Anderson）認為，波伏娃有時會受一些規範性的成規習俗的限制。參 Pamela Sue Anderson, 'The Lived Body, Gender and Confidence', in *New Topic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ontestations and Transcendence Incarnate*, ed. Pamela Sue Anderson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 2010), 163-180.

伏娃同樣的方式想像著一個更好的世界。比如，與許多晚近女性主義者類似，波伏娃認為基督教是造成女性問題的部分原因。她的“男性是一種標準”的分析經常被用來批評基督教的神聖結構、機構化權威及各種壓迫形式^①。但是有一點不可否認，即女性並不總是感覺基督教是障礙，儘管她們中有些人也許已經將自己委身於“錯誤的信仰”^②。

在從事有關女性聖經詮釋批評的博士研究工作時，筆者首先想弄明白，以這種方式來解讀波伏娃思想所暗含的女性在西方和基督教歷史的悖論性缺失/在場。那時，我開始認識到同時存在的兩種努力。那個時期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對聖經做出瞭解讀，聚焦於聖經的“恐怖文本”，即指出在聖經記載針對女性的恐怖暴力故事以及在聖經文本中女性被還原為物體之時，聖經系統性地壓制了女性聲音（女性缺失）。與此同時，其他女性主義聖經批評家們和神學家們也在奮力記錄聖經女性作為行動與話語主體的在場性。美國學者菲麗斯·翠柏（Phyllis Trible）在其著作《恐怖的文本》（*Texts of Terror*, 1984）的每一章都豎起一座墓碑，來紀念那些從聖經文本中被切割出去的女性；而伊麗薩白·舒斯勒·菲奧倫莎（E. Schussler Fiorenza）的奠基性作品《紀念她》（*In Memory*

^① 瑪麗·戴莉（Mary Daly）寫過兩本與此主題有關的經典著作，參 Mary Daly: *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 (Boston, 1968) ; *Beyond God the Father* (Boston, 1973).

^② 波伏娃運用了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 Paul Sartre）的概念——“錯誤的信仰”（bad faith, 又譯自欺），以此來解釋男性如何將壓迫行為理性化以及女性如何接受了被壓迫：“必須承認，男性發現在女性中找到共謀比壓迫者在被壓迫者中找到共謀要容易得多。他們通過錯誤的信仰從壓迫中獲取權威並宣稱她早已渴望得到他們強加給她的命運……她欣然地讓自己期待保護、愛、幫助和其他人的管理，她讓自己沉迷於不勞而獲的自我實現的希望中。她錯誤地屈服於誘惑；但是男人並沒有資格去譴責她，因為是他引領她走入誘惑中。” 參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30.

of Her, 1983) 則平衡了這種企圖。伊麗薩白·舒斯勒·菲奧倫莎的作品通過閱讀和修改從大利拉 (Delilah)^①到敘利腓尼基婦人 (Syrophenician Woman) 等等活潑、魯莽又令人驚歎的聖經女性故事來讓女性作為主體在場。

因此，筆者希冀能公平對待男權體制中女性被壓迫及女性富有適應力和創造力這兩個方面。女性的這種適應力和創造力支撐了整個西方基督教歷史。此外，因為筆者不接受那種“粉飾太平”的媒體宣傳，認為女性現狀整體上來說“不再有問題”，筆者相信針對女性的研究工作對當下和未來的女性一直有著重要意義。

正如筆者前文所言，波伏娃的分析認為女性主體是偶然的、無關緊要並且是典型的“他者”^②。這一精闢分析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起點，幫助我們把這個問題理論化並且進行徹底全面的思考。她的問題“女人是甚麼？”一直與我們這個充斥著大量技術革新、經濟與意識形態不穩定的時代保持著相關性。這個時代固定的性別理念或“傳統的”性別角色不斷被人們討論。同時，筆者挑戰一種人們從波伏娃的作品中獲得的有關女性的看法，這種看法還廣泛反映在西方媒體中：在西方民主體制中，女性在現在這一代之前從來沒有積極地追求去實現自己設計的重要人生目標。我要挑戰這一看法，因為它在很重要的意義上支持一種標準的男性觀點，認為主要是男性（總體來說西方男性）決定了所有至今

^① 另外還有巴爾 (Mieke Bal) 在《死亡與不相稱：〈士師記〉中的連貫政治》中的解讀。巴爾質疑傳統的“連貫一致性” (coherence)，因這種“連貫一致性”將大利拉這個聖經人物當作一種狡詐的“蛇蠍美人” (*femme fatale*)。巴爾把大利拉讀為一個智謀師，幫助苦惱的參孫找到他自己內心的“連貫一致性”。參見 Mieke Bal, *Death and Dissymmetry: The Politics of Coherence in the Book of Judge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②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16.

仍有影響的人類大變革進程的方向。相反，筆者試圖提議，女性的影響也許超出了男權或女性主義極端思想通常所允許的範疇。這是一個複雜的假設，幾乎無法同時全面去討論。在本文中筆者擬為與基督教有關的臆斷說幾句好話。這種觀念認為基督教扮演了父權制角色，在歷史長河中絕對成功地管制和壓制了女性。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筆者將運用另外一位哲學家朱麗婭·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批評工具來探索女性作為有創造性的人類主體這一觀點。結合本文的處境，筆者特別選擇她的“女性天才”概念。

二、女性天才

在西方歷史中，“天才”總是如此緊密地與男性之陽剛特徵聯繫在一起，以至於人們談論“女性天才”時總覺得有些古怪的“不搭調”（mismatch）^①。很明顯，這個問題中有人們試圖回避的東西，而“天才”兩個詞被放入了引號內。克利斯蒂娃和在她之前的波伏娃一樣^②，認識到要稱呼一位元女性為“天才”，就要確立一位女性的主體地位，確立女性不是男性恐懼或渴望的對象。這正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要處理的中心問題。用波伏娃的話來說：“只要她還在努力掙扎去成為一個人，她就不能成為一個創造者……”^③結果，在波伏娃寫作時，她將神話、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當作合謀對付她和她所代表的整個性別的假想

^① Christine Battersby, *Gender and Genius* (London: Women's Press, 1989), 78.

^②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22-723.

^③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23.

敵。她並不總是能看見，在她的寫作及她所構想的概念中，她自己已經設法獲得了主體地位。

克利斯蒂娃認同波伏娃的觀點，認為成為一個人並擁有一個主體地位是一場鬥爭，但是她不贊同波伏娃狹隘的邏輯立場，不認為這是一場毫無結果或女性不可能獲勝的鬥爭。但是克利斯蒂娃同時也理解這中間依然存在著問題。對克利斯蒂娃來說，這個建立主體地位的過程本身就是天才的工作：“一位天才的工作在主體生成之時達到頂峰。”^① 換言之，成為主體^②不是某種天才能夠被嫁接的初步過程。克利斯蒂娃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努力，或多或少成功地復興、震驚甚至重塑人類生存狀況^③，而天才（如波伏娃自己）也能因為這些事情引起我們的關注。但是當克利斯蒂娃稱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心理分析家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作家兼 20 世紀名流科莉特（Colette）為女性天才之時，她並不僅僅指這類原因。相反，克利斯蒂娃如此稱呼她們是因為一個事實：她們在這些領域選擇主體性地位而且從未隱藏她們的女性情感、欲望或者掙扎。當然，在一個以男性為標準的世界做一名女性，突出的困難是很難確定自己的身份，女性大多被認為不過某些男性的追隨者或者門徒。因此，“女性天才”是一種有創造性的特性（uniqueness）或者特點（singularity）^④，包含、質疑並重新定義傳統上對女性的理解以及人們對女性能夠或不能做甚麼的理解。

^① Julia Kristeva, *Hannah Arendt*, trans. Ross Guber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x.

^② *Ibid.*, xi.

^③ Kristeva, *Hannah Arendt*, xi; Julia Kristeva, *Colette*, trans. Jane Marie Tod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407.

^④ Julia Kristeva, *Colette* (New York, 2005), 404.

克利斯蒂娃通過革新我們對“女性天才”的理解挑戰了波伏娃對天才的華麗描述^①以及她對女性解放的理想化描述，這兩點在當前的環境中都無法達到^②。在克利斯蒂娃眼中，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是落入了波伏娃自己在別處強有力抨擊過的標準和價值觀。克利斯蒂娃另闢蹊徑去發現另一種可能性，試著在女性通常所做之事以及她們可能特別擅長（或者更有可能不擅長）的事情中尋找天才。也就是說，她給我們展示了天才誕生的確切背景以及天才所取得成就的種類，而這些以前都被認為太女性化、太不重要而被人們忽略。當然，我們有必要指出，這不是某種暗度陳倉重新將女性邊緣化的方法。在一個尚未變革的父權制社會背景中，很容易生產無實質內容的男女平等假像。我們都很熟悉這種論調，認為女性（以及男性）在持守他們的傳統角色時生活最幸福。這種男女的傳統角色常常因為此類原因而被合法化，但其實是建立在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基礎上，曾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猛烈批判^③。這種論調不可避免地掩飾或者無法認識到這些傳統角色如何為一個很明顯的父權制謀劃（agenda）效勞。

在克利斯蒂娃將母親推舉為“女性天才”之時，她指的是工作的母親們。讓她震驚的是，這些母親不斷被人們指手畫腳地評斷：“做一位元母親和女性的方式有時被熱烈地接受，有時被完全拒絕或者交織著矛盾，但這賦予了母親們完全屬於她們自己的天賦。”^④ 在渴望成為一位母親卻又不希望被母親身份局限時，

^① Beauvoir, *Second Sex*, 722. 比如“那些已經提出要在人類個人存在中重新制定全人類命運的人”。

^②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24.

^③ Beauvoir, 35-69, 'The Data of Biology'.

^④ Kristeva, *Arendt*, xv.

女性通常都要掙扎，因為做母親同時又做另外一個人需要付出相當多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這位工作的母親不得不努力反抗人們對母親的規範性期待，這種期待不可避免地盛讚一種角色（女性及母性的）而貶低另一種角色（陽性及非母的）。根據克利斯蒂娃的思路我們得出新的“天才”定義：一位工作的母親可以通過追求各種創造性的工作樂趣而成為天才，她無需給那些激勵她奮鬥的渴望貼上標籤，無需點明哪些是“合適的”女性渴望或哪些是“不合適的”男性渴望。

認識到女性在抵制各種性別的成規舊識或性別限制所取得的成就之後，克利斯蒂娃據此批評了波伏娃對特雷莎修女（Mother Theresa）和科莉特（Colette）等女性生命的評價。她認為，波伏娃只是利用這些女性來舉例說明女性環境的限制性，沒有在這些限制之外給與她們任何讚揚。對克利斯蒂娃來說，這些女性是“展示她們天賦的榜樣”^①。她認為波伏娃只用這些女性的故事來佐證自己有關女性生存狀態的分析，沒有承認她們作為單個的主體在如此有限的環境中所取得的成就。克利斯蒂娃指責波伏娃非常不公地忽略了“每個女性自由地實現目標”的可能性，或女性的“個體自主性和女性創造性”^②。與此相對，克利斯蒂娃爭論道，她的三位女性天才——阿倫特、克萊因和科莉特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展示了她們的自由”或“無須聽從主流思潮、機構、黨派或者學派而去探索的自由”^③。換言之，儘管不易，她們可以為自己選擇：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有丈夫情人或沒有、可以使用自己獨創的辭彙、制定自己的計畫等等，她們因此改變了她們

^① Kristeva, *Colette*, 406.

^② *Ibid.*

^③ Kristeva, *Arendt*, xix.

居住的世界。儘管克利斯蒂娃在某些方面批評波伏娃，但她最終承認波伏娃出版的作品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強化並重新定義了與女性生存現狀有關的問題——女性毫無疑問被父權文化的要求所限制。意義深刻的一點是，克利斯蒂娃在自己有關女性天才的三部曲之第三卷結束之際將這個三部曲獻給了波伏娃。^①

但是，克利斯蒂娃基本上還是一位樂觀主義者。她認為女性正慢慢地從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限制^②中被釋放出來，因此所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比如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有人可能認為她過於樂觀了，不能充分意識到在接納她的法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被邊緣化的女性困境。確實，對克利斯蒂娃來說，女性的主體地位問題從根本上是一個哲學或者心理語言學問題，而不是建構並理解性別差異的問題。她並不讓自己捲入一些緊迫政治問題之中（如為同工同酬而戰或反對工作中的性別歧視）。然而，她對“女性天才”的重新定義有其政治內含。它瞄準男性規範社會之“想像”，讓在所有結構和機構中運作的、排斥一切的父權制謀劃（agenda）無處藏身。

三、一位女性天才——簡·利德

儘管女性經常是邊緣化和男性統治的犧牲品，但不是所有女性都只是逆來順受地接受這種命運。比如在簡·利德（1624—1704）的這個例子中，女性有時會以有創意的方式來應對父權文化的碎片化及壓迫，儘管人們可能沒有公開認可這種方式。在這個部分，筆者擬繼續挑戰另外一些對女性生存狀態並無

^① Kristeva, *Colette*, 407.

^② Kristeva, *Arendt*, xii.

裨益的觀念。比如，有一種觀點認為，女性如果同情認可基督教就是在“錯誤的信仰”中行動，或僅僅因為某些女性還沒有被人們廣泛記住就認為她們已經失敗（即便她們並未因此而受責備）。因此，簡·利德不被認為是一位有天賦的天才作家，其作品不能進入西方描寫神聖事物的嚴肅文學經典，上面的原因可以解釋利德的這種“失敗”（至少在幾個世紀中是如此）。這可能只是父權制將女性邊緣化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但是，我們如果這樣設想就比較合情合理：利德正在做著與克利斯蒂娃的“女性天才”概念很接近的事情，她挑戰了傳統的“女性應該依附於男性”或女性應該“聽從其他人的判斷”的認識^①，她不斷增強自己的信心，堅持自己的觀點，忽略作為女性環境強加給她的限制。

現在讓我們比較詳細地回顧一下簡·利德的生平和工作。1640年，16歲的利德有了一次突然而劇烈的基督教信仰認信經歷^②。她說服父親允許她在倫敦的已婚哥哥家住了六個月。在倫敦她積極地體驗了眾多教會，尋求精神上的支持^③。這些都顯示出一個年輕女性的獨立心靈。正如許多證據表明，這個時期她也試圖說服她的雙親讓她按照自己的意願嫁人。但是20歲時她開始了父母為她選擇的傳統婚姻生活。她嫁給了威廉·利德，這段婚姻看不出不幸福。但是她的屬靈自傳表明，1660年代早期她已經開始感覺受到環境的限制，並經歷了她認為是神聖的異象（vision）^④，

^① Mary Astell,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Profess'd by a Daugh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705), 6, as quoted in Dale A Johnson, *Women In English Religion: 1700-1925* (New York & Toronto, 1983), 15-16.

^② Julie Hirst, *Jane Leade: Biograpy of a Seventeenth Century Mystic*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16-17. sentment.

^③ *Ibid.*, 18.

^④ *Ibid.*, 25.

這些異象挑戰了她的家庭生活的範疇和資源，給她的渴望和奮鬥提供了新的目標。

1670年利德的丈夫去世時，她突然發現自己從這段婚姻中解脫出來了。她似乎一直抗拒每一種友善和好意的再婚提議（她丈夫沒有給她留下一分錢），不願再被拖回到家庭的狹小環境中^①。這一次她把關注她所看見的異象和發展神學放在第一位。波伏娃在《第二性》^②中尖銳地指出過，女性若能維持受傳統限制就能夠得到不少物質益處，但是為了追求自己的需求與渴望，利德似乎已經完全準備好捨棄這些物質利益。她認為這些渴望及她被呼召去從事的工作對她意義重大。不論別人如何揣測她的選擇（她的已婚女兒就認為她毫無遠見！）^③，她堅定不移地堅持自己的選擇。她只願與那些允許她去追求她自己的願望、去做她感覺被呼召去做的事情的人同行。她的行動不再會只為了使得自己和家庭生活更容易。

1696-1701年她的屬靈日記《園中之泉》（A Fountain of Gardens）出版之時，簡被稱讚為倫敦非拉鐵非協會（Philadelphian Society of London）的異象領袖。那時她已是一位在歐洲享有聲譽、著作等身的女性。她沒有按照當時社會習俗的限制性要求來決定自己的生活，而是選擇了做一位神秘主義神學家，重新撿起她少女時期的夢想。在那個時代，創造了一個特立獨行的普救主

^① Julie Hirst, *Jane Leade: Biography of a Seventeenth Century Mystic*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28.

^② Se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21. "Man-the-sovereign will provide woman-the-liege with material protection and will undertake the moral justification of her existence; thus she can evade at once both economic risk and the metaphysical risk of a liberty in which ends and aims must be contrived without assistance... she is often very well pleased with her role as the Other."

^③ Julie Hirst, *Biography*, 28.

義神學異象。

利德作品中的一些主題也反映了利德對環境限制的創造性回應。她憑藉女性天才對基督教上帝進行了獨特的描述^①。比如，在《園中之泉》中利德將索菲亞（Sophia）當做一個神學比喻（theological trope）。這一處理非常複雜。她在冗長而精緻的語句中織入不同的形象，讓這些句子很難懂，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形象很有生命力和感性，很適合大聲朗讀，因為只有出聲朗讀才能顯露其文本中的節奏和韻律格式^②。當然，她的思考屬於某一神學傳統，特別反映出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雅各·伯麥（Jacob Boehme）的影響^③。伯麥早期所運用的索菲亞形象取自聖經和次經智慧文學，是上帝創造性話語的女性擬人形象。然而，儘管受伯麥原則的影響很深，利德有自己的觀點和異象，她所強調的索菲亞比伯

^① Most references will be to *A Fountain of Garden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696-1701 in three volumes, and which contains a series of actual and spiritual visions she had experienced and recorded twenty years previously. In this text, she describes the journey of her soul and the processes of its illumination and purification Julie Hirst, *Biography*, 41.

^② See also on this, Catherine F. Smith, "Jane Lead: Mysticism and the woman Clothed with the Sun" in Gilbert, Sandra & Susan Gubar (eds), *Shakespeare's Sisters: Feminist Essays on Women Poets* (Bloomington, 1979).

^③ Ultimately, Hirst notes that Leade departs significantly from Boehme on the important issue of predestination adopting, from the mid 1680s a concept of universal salvation, authority for which she claimed 'as a prophetess revealing God's will' and going beyond either scriptural sources or previous 'authorities' such as Boehme. See Julie Hirst, *Biography*, 116.

麥的更強烈，而且神學上更具探索性^①。

利德在擴展聖經中的雅各與利百加故事^②時堆積了許多讓人暈眩和混亂的意象與暗喻。比如，她把自己看成利百加，她為她的丈夫以撒預備可口的佳餚，而這是從她的長子以掃那兒騙取長子權計畫的一個部分。在另外的時刻，她把自己看成利百加的愛子雅各，要從母親直接的策劃中獲利。有時她把自己看成孩子，雅各做湯時宰殺的犧牲品，而這些暗指她將自己作為獻祭品奉獻給上帝的經文援引了“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以及耶穌作為逾越節羔羊（Paschal Lamb）的形象。

利德的感情（sentiment）對現代的女性主義者來說顯得非常陌生。但很明顯，她以一種非常自信的方式走進經文，而她精心建構的暗喻表明她能夠想像、思考、建構一些東西，這些思想超越了傳統所認為的女性所合適的角色或能力。比如，很特別的一點是，她認為自己和雅各一樣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法定的繼承人，卻是被揀選的那位。對於一位女性來說，要在這個很明顯由男性佔據主要地位的世界取得成功，選擇被神意支持的、自命不

^①See Julie Hirst, *Biography*, 7. According to Hirst, Leade uses Sophia, not an image that figured largely in more conventional Christian writing of the period, consciously and creatively as a theological tool Sophia is:

- Preserver and revealer of the mysteries of God
- Mother and maternal guide or teacher of those who belonged to her spiritually supervising their rebirth and entry into the covenant of the Philadelphian Community.
- The bride with whom humankind was destined for spiritual marriage
- Divine Queen and consort

Divine principle implanted into humanity that predestined them for perfection. See also Julie Hirst, *Biography*, 62.

^② See *Genesis* 27.

凡的雅各以及他足智多謀的母親利百加來作為她的神聖眷顧人是多麼恰當啊！^①

我覺得可以清楚看到，這些暗喻以及她使用這些暗喻的方式表明她意識到了傳統用性別來區分和塑造人的方式，但是與此同時也展示了她如何有能力超越這些傳統習俗的限制，去塑造新的代表人物。這種新的代表形象直接回應了她的渴望。她渴望用自己的術語獲得更多的理解。

五、 結論

總之，利德是 17 世紀的女性個例 (singular)，她的文學成就和其他女性作品一起可能不被西方那個時期框定為可接受的、有關神聖的嚴肅寫作的男性認為值得閱讀。我很清楚，直至今日依然有人認為女性的自由和創造性有限，這種認識耗盡了無數女性和少女的創造性能量並消滅了她們的生命。但筆者對這個事實感興趣：依然存在像簡·利德這樣的女性，將畢生生命奉獻給寫作，她們不是單純地折射男性的標準和期望，而是很明確地為她們自己一個也許很小但堅定奉獻的閱讀群體寫作。利德在她的基督教作品中創造了新的思想和人際、人神關係，這些思想來自她自己的閱讀和異象經驗，來自她與心靈相通的人的交談。這樣就孕育了女性天才，很含蓄地抵制了有關女性能力的質疑並且對波伏娃的問題“女人是甚麼？”做出了新的回答。在規範性的男性世界中女性的能力永遠不會完全被吞沒。我已經提出，我們不能忽略和遺忘結構性父權體制的後果，不能允許這些後果來抹殺女性

^① 儘管在她的解釋中利德在傳統基礎上為以掃喪失合法繼承權做了“合理性”解釋。傳統認為以掃等同於身體的塵世生命。

在生養孕育和發明創造等眾多領域中所擁有的獨特的創造性。利德宣稱自己是基督教女先知、女性異象家和女作家，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並且成為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女性在基督教兩千年歷史中的一種恒久且有創造性的在場。這種在場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被世界認真思考和接受，而不僅僅是維持統治結構的例外個案。這種在場應該作為女性寫作傳統的元素被人們接受，因為這些元素有著帶來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神學轉變的潛能。

參考文獻：

1. Astell, Mary.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Profess'd by a Daugh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705. in Johnson, Dale A. *Women In English Religion:1700-1925*. New York & Toronto: Edwin Mellen Press, 1983.
2. Battersby, Christine. *Gender and Genius: Towards a Feminist Aesthetics*. London: The Woman's Press, 1989.
3.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4. Boer, Roland and Øklund, Jorunn eds. *Marxist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8.
5. Daly, Mary. *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6. _____. *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7. Fiorenza, Elisabeth Schüssler. *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 London: SCM Press, 1983.
8. Hirst, Julie. *Jane Leade: Biography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Mystic*. Aldershot, Hants &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9. Jasper, Alison. 'Female Genius: Jane Leade (1624 – 1704),'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New Interdisciplinary Spaces*, ed. Walton, Heather.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0.
10. Jasper, Alison. *Female Genius And Feminist Theology: Four Historical Cas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Waco, TX, forthcoming.

11. Kleinberg, S. J.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45 (American History in Dep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12. Kristeva, Julia. *Colet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_____. *Hannah Arend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_____. *Melanie Kl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 Purvis, Jane. *Women's History: Britain 185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6. Smith, Catherine F. 'Jane Lead: Mysticism and the woman Cloathed with the Sun.' Gilbert, Sandra & Gubar, Susan eds. *Shakespeare's Sisters: Feminist Essays on Women Poe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7. Trible, Phyllis. *Texts of Terror*. London: SCM Press, 1984.

作者簡介：愛麗森·賈斯柏（Alison Jasper），英國斯特林大學。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Alison Jasper,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譯者簡介：張靖，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mail: zhangjingwise@gmail.com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ZHANG 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